

中国考古集成

苏秉琦题



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战国秦汉(一)



东亚文库

中国考古集

苏秉琦题

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战国秦汉(一)



哈尔滨出版社

k87-53
20122
10

《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主 编 孙进己 苏天钧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蔺新建 孙 泓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绵厚 冯永谦 齐 心 张畅耕 郑绍宗 韩嘉谷

编 者

综 述(一)

孙 海 王 雷 张春霞

综 述(二)

孙 海 贺 平 王 雷

旧石器(一)

孙 海 张春霞

旧石器(二)

孙 海 贺 平

新石器(一)

李晓钟 蔺新建

新石器(二)

蔺新建 李晓钟

商 周(一)

蔺新建 刘 宁

商 周(二)

蔺新建 刘 宁

商 周(三)

刘 宁 蔺新建

战国秦汉(一)

孙 泓 佺俊岩

战国秦汉(二)

孙 泓 张春霞 李 威

战国秦汉(三)

孙 泓 佺俊岩

魏晋至隋唐(一)

孙 泓 张春霞 李 威

魏晋至隋唐(二)

孙 泓 张春霞

宋 辽(一)

姚义田 袁 辉

宋 辽(二)

贺 平 姚义田

金 元(一)

申国俭 刘焕民

金 元(二)

刘焕民 申国俭

明 清(一)

阎中发 贺 平 孙琰琍

明 清(二)

孙 海 阎中发 黎凤春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孙海	孙泓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王雷	王宏刚	王绵厚	冯永谦	孙泓	孙海	孙进己
		齐心	刘永智	苏天钧	刘国有	吴文衍	李品清	李之勤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崔灿	孟广耀	周光培	周伟洲
		郑绍宗	徐德源	黄凤岐	朝鲁	蒋秀松	魏国忠	穆鸿利	
编辑部主任		孙泓							
校	对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剑	刘娟	孙月辉	张晶晶	邹德兰	姜伟	倪文华	赵锦红
		徐坤	郭妍萍	康欣瑞	黎凤春				

《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

名 誉 主 编	苏秉琦							
顾 问	佟柱臣	张忠培	朱子方	干志耿	孙守道	李逸友		
主 编	孙进己	苏天钧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蔺新建	孙 泓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绵厚	冯永谦	齐 心	张畅耕	郑绍宗	韩嘉谷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王 侠	王武钰	王绵厚	尹学伟	云希正	田淑华	宁立新
	冯永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齐 心	朱德威	刘世枢	刘建忠
	苏天钧	张庆捷	张志立	张畅耕	张春霞	李经汉	杨新平	杨富斗
	贺 平	赵福生	高 可	阎中发	姚义田	唐云明	黄凤岐	陶富海
	韩嘉谷	蔺新建						

目 录

燕君“禅让”辨·····	王彩梅(1)
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	苏天钧(8)
北京郊区发现汉代古城遗迹·····	(10)
北京市天坛公园内出土一对铜壶·····	王汉彦(11)
北京市周口店区蔡庄古城遗址·····	王汉彦(12)
北京市窦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	叶学明 陈 光(13)
北京市周口店区窦店土城调查·····	刘之光 周 桓(27)
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30)
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释文·····	邵茗生(39)
关于渔阳城的位置及其附近河道的复原·····	郭 仁(41)
北京昌平区松园村战国墓葬发掘记略·····	苏天钧(43)
北京西郊八里庄发现战国瓮棺·····	安志敏(46)
房山县琉璃河刘李店战国墓地·····	(47)
北京昌平半截塔村东周和两汉墓·····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48)
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52)
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	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75)
大葆台西汉墓墓主考·····	王灿炽(83)
试谈大葆台西汉墓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	鲁 琪(86)
北京昌平史家桥汉墓发掘·····	喻 震(90)
北京平谷县西柏店和唐庄子汉墓发掘简报·····	向 群(96)
北京西郊发现的瓮棺·····	安志敏 伊秉枢(105)
北京西郊中关园内发现瓮棺葬·····	(109)
丰台区三台子出土汉画像石·····	喻 震(110)
北京顺义临河村东汉墓发掘简报·····	黄秀纯(111)
北京东南郊三台山东汉墓发掘简报·····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17)
北京永定路发现东汉墓·····	喻 震(126)
北京教育学院东汉墓·····	李 达 王武钰(127)
海淀区上地村东汉墓·····	李 达(128)
平谷张岱村东汉砖室墓·····	杨学林(129)
北京朝阳门外出土的战国货币·····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30)
北京房山区出土燕国刀币·····	柴晓明 龚国强(132)

怀柔县崎峰茶公社发现汉代马蹄金	张先得(134)
石景山区衙门口村出土两汉古币	陈 康(135)
北京历史博物馆展出望都汉墓壁画	(136)
北京又发现燕饔饕纹半瓦当	张 宁(137)
一件战国的带把陶杯	黎 晖(138)
跋皇建玉柙	朱文钧(139)
北京丰台区出土战国铜器	张先得(141)
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	程长新(144)
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	程长新(148)
变形蟠虺纹铜敦	(156)
北京市拣选的燕国铜器	程长新(157)
北京市拣选的春秋战国青铜器	程长新(159)
战国宴乐射猎攻战纹壶	唐复年(162)
嵌赤铜狩猎纹豆	丁 孟(166)
吴太平元年神兽镜	程长新 马希桂(169)
北京市天坛公园内出土一对铜壶	王汉彦(170)
西汉堂阳侯错银铜虎符考释	傅振伦(171)
汉嵌孔雀纹铜管	王海文(173)
战国成语玺析义	叶其峰(174)
关于博物馆藏传世汉匈奴语官印考	黄盛璋(178)
居庸关之名始于秦始皇北筑吗?	吉 人(183)
古道观石刻	珠 丰(185)
东汉《乙瑛碑》	翁秀芳(187)
故宫藏石两种	叶其峰(188)
书风典雅 拓工精良	王玉池(192)
汉石狸力兽初探	马子云(194)
春秋战国时期天津地区沿革考	刘幼铮(196)
宝坻县秦城为战国右北平郡故城的调查和考证	韩嘉谷(200)
天津平原的西汉县治和相关历史	韩嘉谷(207)
关于渔阳、范阳、蓟县的方位问题	杨志玖(211)
泉州故城的初步考察	郭振山(213)
渔阳、蓟、无终变迁考	吴殿聪(218)
河北宁河县先秦遗址调查记	安志敏(220)
天津市郊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与发掘记略	云希正(223)
渤海湾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227)
天津宝坻县牛道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 宝坻县文化馆(235)
天津南郊巨葛庄战国遗址和墓葬	孙培基(245)
天津北仓战国遗址清理简报	韩嘉谷(250)
大秦铁路蓟县段考古调查	赵文刚 纪烈敏 梁宝玲 韩嘉谷 张俊生 邸 明(254)
天津市武清县兰城战国及汉代遗址	韩嘉谷 纪烈敏 张俊生(255)
宝坻、武清古遗址	韩嘉谷(256)
静海县西钓县古城址的调查与考证	刘幼铮 华向荣(257)
武清兰城遗址发掘	纪烈敏(261)

宝坻县秦城·····	韩嘉谷 纪烈敏 张俊生 李寿祥(262)
东郊区务本古城·····	韩嘉谷(263)
天津东郊发现战国墓简报·····	云希正(264)
天津东郊张贵庄战国墓第二次发掘·····	云希正 韩嘉谷(269)
天津北郊发现一座西汉墓·····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271)
天津蓟县邦均两座古墓的清理·····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273)
宁河县田庄坨汉墓清理简报·····	邸明(276)
天津南郊窦庄子隋墓和汉代瓮棺墓·····	天津市文管处(278)
蓟县发现了几处汉墓群·····	郑绍宗(281)
武清东汉鲜于璜墓·····	教承隆(282)
武清县发现东汉鲜于璜墓碑·····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 武清县文化馆(299)
鲜于璜汉墓的发掘·····	天津市文管处考古队(302)
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补释·····	陈雍(305)
珍贵的汉碑·····	孙福山(308)
浅析东汉鲜于璜墓出土的陶灯·····	教承隆(309)
蓟县别山汉代墓地·····	赵文刚(312)
蓟县辛西村汉墓·····	梅鹏云(313)
天津市静海县东滩头汉墓·····	赵文刚(314)
蓟县东关汉墓·····	赵文刚 邸明 梅鹏云(315)
蓟县电厂汉代墓葬·····	(316)
蓟县西后街汉代墓地·····	赵文刚 梅鹏云(317)
“平舒”戈、“舒”豆和平舒地理·····	韩嘉谷(318)
“启状戈”小考·····	田凤岭(323)
静海县发现陈和量陶考略·····	田凤岭(326)
新发现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	田凤岭 陈雍(328)
“丞相启”即昌平君说商榷·····	胡正明(330)
新发现的一方战国玉玺·····	尤仁德 田凤岭(331)
行气玉铭·····	崔乐泉(332)
关于“行气”铭文玉杖饰的几点看法·····	王璧(333)
阳燧·····	尤仁德(336)
汉“火燧”铭文考释·····	陈邦怀(338)
静海县东滩头汉墓陶楼·····	赵文刚(339)
西汉平都犁斛·····	云希正(341)
上林共府升·····	卢永瑀(343)
河北省发现的青铜短剑·····	郑绍宗(345)
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铭青铜器·····	李学勤 郑绍宗(348)
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	刘建华(355)
略谈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疆域问题·····	郑绍宗(365)
试论中山三器的铸造年代及中山王𰔰的在位时间·····	尚志儒(374)
中山国青铜艺术的特色·····	史石(379)
中山国自铸货币初探·····	高英氏(382)
初论战国中山国农业发展状况·····	陈应祺 李恩佳(386)
略论战国中山国货币制度·····	高英氏(390)

中山灵寿城址考古综论·····	陈应祺(399)
中山国故都——古灵寿城考辨·····	柳石王晋(404)
论中山国都城灵寿城的营建·····	陈应祺 李恩佳(408)
中山国灵寿城第四、五号遗址发掘简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411)
中山国灵寿城遗址陶器初探·····	陈应祺 李恩佳(428)
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	刘来成(432)
试谈战国时期中山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	刘来成 李晓东(460)
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	朱德熙 袁锡圭(464)
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	李学勤 李零(473)
中山三器铭文考释·····	于豪亮(488)
中山三铭与中山史考辨·····	何直刚(496)
中山王器考释拾遗·····	何琳仪(499)
试谈平山三铜器·····	钟凤年(504)
平山三器若干问题研究·····	王勇(505)
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	李学勤(510)
战国中山王𰮞墓出土的《兆域图》及其陵园规制的研究·····	傅熹年(514)
释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器物铭文中的“𠂔”和“私库”·····	吴振武(528)
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	(530)
中山金器刻辞再推敲·····	何直刚(545)
中山国玉卜辞试释·····	林杰 马涛(546)
谈几件中山国器物的造型与装饰·····	巫鸿(550)
中山国守丘刻石及其价值·····	李晓东(554)
从考古发现谈中山国的崇“山”特点·····	陈应祺(556)
中山国人俑灯和连盏灯的艺术特色·····	何直刚(558)
犬文物漫谈·····	杨泓(559)
薊城的探索·····	赵其昌(562)
郾王铜兵器研究·····	石永士(567)
战国燕国铜器铭刻新考·····	黄盛璋(573)
燕兵器铭文格式、内容及其相关问题·····	沈融(577)
燕王铜戈研究·····	石永士(584)
战国时期燕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石永士(589)
燕国的衡制·····	石永士(595)
试论“𠂔”字刀化的几个问题·····	石永士 王素芳(600)
圜币管窥·····	朱活(619)
以铅铸钱始于燕·····	嵩山(639)
燕国布币考·····	何琳仪(642)
燕国明刀面文释“明”之新证·····	唐石父 高桂云(647)
燕刀“𠂔”字新解·····	黄锡全(651)
试论中山国仿铸燕国“𠂔”字刀的历史背景·····	高英民(657)
燕国货币的发现与研究·····	石永士 王素芳(662)
赵国方足布三考·····	何琳仪(684)
非为明刀应为燕刀·····	王海航(687)
论古城邯郸的重要历史文化地位·····	郝良真 姜春(689)

古赵王城遗址觅踪·····	周振国(694)
试论两汉的玉衣·····	卢兆荫(696)
关于“金缕玉衣”的资料简介·····	史 为(703)
从考古发现看河北从商至西汉的医药学成就·····	杨 木(706)
试论满城画像石·····	郭 铮(712)
西汉白檀县故址考·····	陈 烈(716)
中峰顶与汉武台·····	岳 辰 郭泽民(718)
“碣石宫”质疑·····	董宝瑞(721)
碣石考辨·····	黄盛璋(724)
河北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的发掘·····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726)
王郎村古遗址试掘简报·····	邯郸市文物管理处(732)
邯郸市台地遗址发现铸炉址·····	乐庆森(736)
河北遵化县出土周、汉遗物·····	常力军(737)
河北省唐县发现古城址古遗址各一处·····	冯秉其(738)
滦县发现了古文化遗址·····	冯秉其(739)
石家庄市发现古村落遗址·····	王海航(740)
河北省邢台市发现一处古遗址·····	唐云明 罗 平 程明远(741)
河北承德专区汉代矿冶遗址的调查·····	罗 平(742)
唐山市贾各庄发掘记略·····	安志敏(745)
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	安志敏(749)
丰润东欢坨战国遗址·····	陈应琪(792)
河北邯郸赵王陵·····	罗 平(793)
两千年前的古酒·····	蔡应才(803)
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	孙德海(804)
承德县房身沟发现战国墓·····	刘 朴(824)
河北平山县三汲村发现战国墓·····	康保柱(826)
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墓·····	高英民(827)
河北新乐中同村发现战国墓·····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830)
河北灵寿县西岔头村战国墓·····	文启明(836)
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发现的战国墓·····	陶宗冶 贾瑞芳(841)
元氏县发现一座石板墓·····	张金栋(843)

燕君“禅让”辨

王彩梅

公元前四世纪,地处今北京地区的燕国,发生了震惊战国七雄的“燕王哙让子之”事件。这是燕国史上的大事,它不仅仅酿成了燕国的内乱,而且还招致了其他国家乘机出兵干涉,从而引起了一场内外矛盾纵横交错的战争,几乎导致了燕国的灭亡,后世史家对此也有各种不同的评论。然而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它的历史真象究竟如何?这在燕国历史上还是一个至今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古今评论

公元前316年^①,燕国国君燕王哙,将自己的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且还将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印玺收回交给子之,听从他重新任命。于是,“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②”。经过这次“禅让”后,燕王哙把燕国大权已全部交给了子之。

对于这个事件究竟应该怎样看,自古至今一直就存在着各种评论。战国及汉代的学者们有不少人在著作中提到这次事件,他们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总结统治经验的角度出发,所提意见也是各种各样,其中有的认为燕国的禅让所以遭到失败,是由于这个事件出现于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例如:

《庄子·秋水篇》云: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

《淮南子·人间训》曰:

夫徐偃王为义而灭,燕子哙行仁而亡,哀公为儒而削,代君为墨而残。死、亡、削、残暴乱之所致也,而四君独以仁、义、儒、墨而亡

者,遭时之务异也。

也有的认为,燕国发生的事件是由于燕王哙好让,图虚名,未实行法治的结果,《盐铁论·诏圣篇》曾有以下一段分析:

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谿,可临而不可入……鲁好礼而有季孟之难,燕哙好让而有子之之乱。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潜夫论·实贡篇》也说:“燕哙利虚誉,故让子之。”对此事评论最多的是《韩非子》一书。在这部书中,有不少篇章从各方面对燕王哙让位给子之的事件进行了评论,其中论点之一,是认为燕王哙用人不明。例如,在《说疑》篇中说,燕国“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千万”,而燕王哙最后却落得“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用臣也”。这里所说的“不明乎用臣”,就是指的对子之的任用是不适当的。

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了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很多重要的古代文物。中山国是燕国的近邻,燕国发生的“燕王哙让子之”事件,中山国的统治集团不仅耳闻目睹,并且最后还参加了侵燕的战争,在出土的“中山王罍壶”中有长篇铭文,其中有一段记录了中山国统治者对燕国发生的燕王哙禅让事件的看法:

郾(燕)君子脍(哙),不辨大义,不忍者(诸)侯,而臣宗易立(位),以内绝邵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则上逆于天,下不忍顺子人施(也),寡人非之。

从这段铭文中可以知道,中山国王对燕国发生的禅让事件是不满意的,而且还坚决反对,主要指责其“臣宗易位”,这是大逆不道的,所以明确表

示“寡人非之”。

古代人对这个事件发表看法的当然还有很多,这里只是选录了一部分,现代学者们对此事也有各种各样的评论,郭沫若对这一事件给予了很高的评论,他认为燕王哙能够将国君的位置禅让给臣下,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奴隶制时代》一文中有一段专门的论述,现摘录如下:

唐虞禅让是原始公社制残留下来的史影,被春秋末年以后的儒家和其他的学派所理想化了,作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企图去追踪,这种理想化的动机是出于改革当时社会的要求的,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应该认为是当时的一种进步的倾向。燕王哙就是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之下而闹着禅让的实践的。作为一国的国王,能把自己的位子心甘情愿的让给臣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燕王哙办到了,足见他不同寻常^③。

杨宽教授对禅让事件的性质也是肯定的,对子之的评价比较高,他在《战国史》一书中说:

公元前316年(燕王哙五年),燕王哙把君位让给了相国子之。子之为相国时,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臣属,得到燕王哙的赏识和重用……燕王哙和子之想要通过禅让的办法来确立地主政权和进行封建的政治改革。

他还说:“[燕王哙禅让]为后来燕昭王奋发图强,进行封建的政治改革扫清了道路”^④。

金景芳在他所著《中国奴隶社会史》一书中也认为:“燕王哙让国一事,也应列入战国时期变法范畴之内”^⑤。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所编的《北京史》一书认为,燕国这次禅让事件是“一部分奴隶主,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所进行的政治改革”^⑥。

侯仁之、金涛所著的《北京史话》一书认为:“燕王哙把君位让给相国子之”,这是“以图振兴燕国”^⑦。

以上各家,有的认为这是“变法”,有的认为是“图治求强”,有的认为是封建地主阶级为“确立地主政权和进行封建的政治改革”;有的认为这是奴隶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进行的“改革”。尽管如此,但有一个基本观点是共同的,各家都认为这次禅让事件的性质是“进步”的,是一次改革,应该给予肯定。可以说,这个基本观点在当前学术界得到了相当多数人的支持,在社会上具有较大影

响,现在看来,这个看法还值得商榷。但是有一点要明确下来,对这次“禅让”事件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首先需要辨明“禅让”事件的历史真象,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适当的分析和论断。

(二)史实辨析

在燕王哙禅让事件中,有很多历史事实需要进一步分辨清楚,但其中最根本的还是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性质。

关于禅让发生的原因,最流行的看法就是所谓“仿效尧舜说”,其基本内容是认为燕王哙所以把国君的位置禅让给子之,就是因为燕王哙想仿效尧舜禅让的故事,因而便身体力行,将君位让给子之。这个说法虽然流行很广,但今天看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进行考察,此说都很难成立。

真正的禅让,也就是说一个国君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条件下,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觉自愿地将国君的位置禅让给比自己能力强的人,让他当国君,自己则心甘情愿地作他的臣下,或者去当平民百姓,接受其统治。似这种出于真心的、纯粹的禅让,就中国历史而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肯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翻开历史看,在中国历史上,自从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后,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直到明清为止,在位的国王、皇帝很多,虽经过多次更替,但还没有发现一位确实是真心实意的、肯于把自己的君位禅让给其他人的国王和皇帝。

不仅阶级社会如此,就是处于刚进入阶级社会前夕的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也未必似后世儒家所美化的那个样子。其真实情况如何,现在看来也是值得研究的。早在三十年代,“古史辨”学派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顾颉刚写了一篇《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⑧,认为尧舜禅让的故事是战国时的墨家学派伪造的。这个说法虽然不一定确实,但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尧舜禅让的故事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当然,联系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问题来讲,关键之处还不在于历史上是否确实存在着尧舜禅让这件事,而是燕王哙是否真正为了仿效尧舜而将君位禅让给子之的。

考察这个问题,需要从审定资料开始,这是解决问题的依据。应该明确的是:燕王哙已经将君位

禅让给了相国子之。这已是既成事实,无庸再议,现在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燕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出这次禅让,其真实情况又是什么?

在现存资料中,比较详细地记载这方面具体情况的史籍是《战国策》、《韩非子》、《史记》等书,就时间先后来讲,《战国策》、《韩非子》的时代较早,《史记》的时代稍晚;就其内容来看,以《韩非子》的记载比较详细。为了便于分析问题,现将《韩非子》中的有关记载摘录如下:

《韩非子·外储说右》:

子之相燕,贵而主断。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齐王亦何如主也?”对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对曰:“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今齐王不信其大臣。”于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闻之,使有遗苏代金百镒,而听其所使之。

一曰。苏代为秦使燕,见无益子之,则必不得事而还,贡赐又不出,于是见燕王乃誉齐王。燕王曰:“齐王何若是之贤也!则将必王乎?”苏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爱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齐桓公爱管仲,置以为仲父,内事理焉,外事断焉,举国而归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今齐任所爱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知闻也。”于是明日张朝而听子之。

潘寿谓燕王曰:“王不如以国让子之。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则是王有让子之之名而与尧同行也。”于是,燕王因举国而属之,子之大重……。

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传之,而实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战国策》中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只是在少

数文字和个别段落上有些区别,其内容是一致的而且在现存史籍中又未发现对此事件有相反的记载。《史记·燕世家》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又是抄自《战国策》的,依照这种情况来看,《战国策》与《韩非子》二书所记内容,应是比较可靠的,这可能就是战国时期社会上比较流行的说法。

仔细阅读上述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谓仿效尧舜的方式进行“禅让”,这并不是燕王哙在没有外力干涉之下,自己主动提出来的意见,而是他人的劝说燕王哙让位时而提出的借口,燕王哙只是“接受”,或者说是“按照”这个意见办的。至于燕王哙为什么要按照这个意见办,这还是一个需要研究探讨的问题。

目前,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对“禅让”方案提出的具体过程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因而在有些著作中,似乎燕王哙理所当然地是自觉自愿地实行“禅让”。有了这个认识以后,一系列看法就随之派生出来了。有的说燕王哙“禅让”的原因是“爱才”,即爱子之之才;有的说是为了“求治图强”,有的说是为了向古代圣贤学习,仿效尧舜的禅让,甚至有的就直截了当地说燕王哙就是“好让”,言下之意,似乎他有点禅让之癖。凡此种种说法,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可靠的根据,都属于判断性的意见。这些判断的立足点,也都是建立在燕王哙是自觉自愿地实行禅让的基础之上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燕王禅让的性质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也未得其解。郭沫若在分析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化时,曾将燕王哙让之子事件与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并列,提出:“燕王哙和子之闹禅让(公元前316年)一事,在今天看来,是应该用另眼看待的”。他分析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性质时说,在战国七雄中齐、韩、赵、魏四国是“采取了革命手段”进行变革;而“楚、秦、燕是采取了由上而下的改革”^⑨。这就明确地把燕王哙禅让事件的性质定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了。这个说法对学术界的影响较大。此后,又出现了一些相近的说法,如:“缓和阶级矛盾”说,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说等等,也陆续提出来。现在看来,这些论断都还值得重新考虑。

探讨这个问题的关键,主要是需要弄清楚禅让的方案是什么背景下提出的、什么人提出的、其目的是什么?

从上述《战国策》、《韩非子》所记载的内容中

可以看出,这个方案是那些向燕王哙进行劝说的人提出的,其中有苏代、潘寿,是否还有其他人,今天已不清楚了。据《史记》中记载还有鹿毛寿,《史记索隐》认为鹿毛寿即潘寿。燕王哙是在他们的劝说下接受了这个方案的。然而,他们提出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什么?有何背景?现在,想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从根本上讲就必须由追查子之的情况入手。

子之其人,在燕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他担任燕王哙之相,身居高位,总揽全国政事,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进一步谋取国君的位置。在现有史籍中有不少处提到了子之,其中对子之的评论都是很不好的。如《韩非子·亡征篇》云:

“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爱信之而弗能废者,可亡也。”陈奇猷集释案云:“谓主又信爱其相而弗能废弃也,如燕哙之信爱子之是也”。

子之的权势很大,燕王又无力量将其废弃,在韩非看来,这就是亡国的象征。正如陈奇猷在注释中所说:“子之相燕,操生杀之柄,民信畏之……是以曰,民信其相乃亡国之征”。这是把子之说成是奸佞之臣,其性质相当于《荀子·臣道篇》中所说的“态臣”。荀子在这篇文章中说:“人臣之论……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此处之“态臣”,杨倞注:“佞媚之臣。”

《韩非子·说疑篇》还把子之与齐之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等并列,云:

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唯圣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乱之君,能见之乎?

这里说子之是个不走正路(“隐正道而行私曲”)、“朋党比周”、好于犯上的作乱者。

子之还善于耍弄手腕,《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诚信不。

在这里,子之虚构了一个“白马”的故事,以此来考察左右对自己是否忠诚,据此可以看出,子之

是一个善于耍弄权术的人。

子之不仅善于耍弄权术,而且还是一个觊觎国君位置的、并抱有篡夺之心的人。为了这个目的,子之竭力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即前引《说疑》篇所引的“朋党比周”、“上逼君、下乱治”、“亲下以谋上”等等。此外,《韩非子·外储说右》在记述子之如何依仗权势培植私人势力的情况时还说:

夫人主之所以镜照者,诸侯之士徒也,今诸侯之士徒皆私门之党也。人主之所以自浅媼者^①岩穴之士徒也,今岩穴之士徒皆私门之舍人也。是何也?夺襦之资在子之也。

子之所以大力培植私人亲信、拉拢党羽,其目的就是为了夺取君权。前面提到的向燕王哙进行劝说的苏代、鹿毛寿等人,就是起了为子之实现这个目的而做说客的作用。

鹿毛寿(或潘寿)的情况如何?现在还不太清楚,《韩非子·外储说右》只说:“潘寿,闾者^②。燕使人聘之。”可见,他是个“隐者”,大约年龄也不会太小,很可能是受了子之拉拢或者根本就是属于子之党羽一类的人物。因而《韩非子·外储说右》中在叙述他初见燕王哙时说:“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如益也。’”他一见燕王就开宗明义地说明,他所担心的就是子之权力不巩固,因而劝燕王哙不仅单纯地将君位禅让给子之,还要让子之能培植个人势力。在他的劝说下,燕王哙“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于是“子之遂重”。潘寿的立场是很明确的。

有关苏代的情况史籍中稍有些记载,他向燕王哙劝说的目的,就是为子之取得君位。苏代与子之关系密切,在《战国策·燕策一》中有以下记载: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持质子于齐,齐使代报燕^③。

按照这里所记的情况看,苏代与子之不仅是姻亲关系,而且还有紧密的政治联系。苏代能够到齐国去,就是子之在其中起了作用。苏代到齐国后,又作为齐的使臣到燕国来,于是发生了劝说燕王哙的事件。

苏代为什么要积极地向燕王哙进行劝说呢?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中有以下记载:

苏代为秦(齐)使燕^④,见无益子之则必不得事而还,贡赐又不出^⑤,于是见燕王乃誉齐王。

从以上记载中可看出,苏代与子之在政治上

是互相利用的。子之在燕国掌权,他想使苏代以外交人员的身份劝说燕王哙让位,而苏代到燕国来从事外交活动,如无益于子之,则他的外交任务完不成,也得不到赏赐。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为了各自的利益结合起来了。苏代的劝说活动很成功,对燕王哙产生了作用,子之对此也很满意。《战国策·燕策一》中说:“[苏代劝说燕王哙重用子之以后]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听其所使。”

此事在《韩非子》与《史记》中均有记载,《韩非子·外储说右》中所记如下:

于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闻之,使人遗苏代金百镒,而听其所使之。

两者所记基本相同,说明此事在战国时期,它的流传范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到汉代,司马迁又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将它写进了《史记》,所以《史记》中关于此事的记载与《战国策》是相同的。

子之赠送给苏代“百金”,这就是赠送给苏代劝说燕王哙活动的报酬,两人的勾结,在这里已表示得很清楚了。

由此可见,燕国禅让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当时向燕王哙进行劝说的人,也是有其政治背景的,这个事件的幕后指挥者,就是子之。

子之为什么能够使自己受“禅”成功呢?主要是由于他培植了个人势力,掌握了燕国很大的权力。在《韩非子》一书中,有很多处论述燕国禅让事件的教训,例如在《爱臣篇》中,就有以下一段明确的记载:

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类也^⑮。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

这里把燕王哙“禅让”的事件,完全看作是一场向国君篡夺政权的事件,并提出了一个篡夺君权的规律性表现,那就是臣下的势力太大,即“诸侯之博大”、“君臣之太富”等,子之也正是由于掌握了过大的势力,才敢于在背后指挥这场“禅让”事件。

“禅让”二字,只不过是好听名称,其本质就是篡权。苏代、鹿毛寿等人向燕王哙提出让燕王哙学习尧舜、将君位禅让给子之的建议,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地向燕王哙索要政权的方案。任何一

个国君,一旦处于这种局面下,都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都会明白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什么。燕王哙不是白痴,他也不会不明白这件事的利害关系,然而他又为什么接受了鹿毛寿等人提出来的“禅让”方案呢?这没有其他解释,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已经培植起来的子之的政治势力的压力下,而被迫接受这个方案。

燕王哙的禅让,并不是仅仅将君位禅让给子之就算完结了,他必须还要把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印玺收回,交给子之,由他重新任命。这是为什么?其问题也很明显,燕国的原任官吏,都是长期在燕王哙手下任职的,现在君权已经“禅让”给子之了,子之不愿继续任用原有官吏,而要重新任用一批顺从自己、忠心为自己服务的大小官吏,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就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燕王哙的禅让,并不是“让贤”。子之也并不“贤”,这种重新任命官吏的办法,完全是为了组织自己的私人势力,以便于独自专权,这中间哪里还有一点爱国爱民的气味!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在燕国发生的这次“禅让”事件,其性质完全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爆发的一场争权夺势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子之经过长期准备,在政治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因而取得胜利,政权到手,“禅让”完成,子之的政治目的也就达到了。

(三)“禅让”对燕国的影响

燕国的“禅让”不是改革,两者性质不同,社会效果也完全相反。改革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进行的变法和改革,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齐威王的改革,使齐国“大治”,“于是齐最强于诸侯”^⑯;楚国吴起变法后,“诸侯患楚之强”^⑰;商鞅变法后,“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⑱;韩申不害执政后,“国治兵强,无侵韩者”^⑲。可见,大凡改革者,都对国家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其社会效果都比较好。而燕国的“禅让”则截然不同,它的结果不仅没能使燕国富强,反而引起了燕国的内乱。《战国策·齐策二》说:“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可见,这次禅让无论在国内、国外都得不到拥护者,反对最激烈的还是在国内。

自从子之篡夺燕国政权后,引起国内不满,公子平联合将军市被起兵反抗之,因而引起了燕国

的内战,使燕国遭到严重的损失。关于这次战争的具体情况,在《战国策》和《史记》中均有记载,《史记·燕世家》云:

三年^②,国大乱^③,百姓恫恐。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诸将谓齐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饰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以为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徇。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今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这场战争十分激烈,“构难数月,死者数万”,损伤是很惨重的。齐国也想趁燕国内乱的时机占领燕国,因而也插手这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燕王哙与子之皆死。

关于齐国插手这次战争之事,与孟子也有牵连,因此在《孟子》一书中对此也有一段记载,可作为对《史记》、《战国策》内容的补充。《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当燕国内乱时,齐宣王问孟子是否可以伐燕,孟子作了比较系统的回答,其中有以下一段话:“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是说,齐伐燕,燕人反而欢迎齐军。此事在《史记》和《战国策》中写得比较具体,《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齐伐燕时,燕国的“士卒不战,城门不闭”。敌军打来,不但不抵抗,反而大开城门,这说明燕国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已经达到了极点。因此齐军能很顺利地占领燕国。

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𪔐壶及中山王𪔐鼎的铭文中,记有中山国在当时也曾出兵伐燕。此事不见于文献记载,这批古代文物的出土,不仅为中山国、燕国的历史补充了新的资料,也使人了解到在伐燕战争中有关中山国的一些具体情况,其中中山王𪔐壶铭文载:

……𪔐曰……𪔐忼(願)从在大夫以靖(靖)郢(燕)疆(疆)。氏(是)以身蒙 牟(皋)冑,以诛不𪔐(顺)。

郢(燕)故君子𪔐(哙),新君子之,不用礼

宜(义),不辨逆顺,故邦达(亡)身死,曾鼠(一)夫之救,述(遂)定君臣之位,上下之体,休有成工(功)创辟封疆(疆)。

其中“𪔐”为人名,在铭文中称“相邦𪔐”,“相邦”为官职,即相国,相当后世的丞相。学者们认为“相邦𪔐”即《战国策》、《史记》中的司马喜。“牟冑”即“甲冑”。这是说相邦𪔐要身披甲冑亲自去伐燕,“以诛不顺”。文中记载中山国伐燕时,“燕君子𪔐、新君子之……邦亡身死,曾无一夫之救”。可见燕国国君在当时是很孤立的,就是这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也竟无一人相救,表明燕国国君已完全失去了民心。

此事在《中山王𪔐鼎铭》中也有记载,其铭云:

……含(今)肅(吾)老𪔐亲率参(三)军之众,以征不宜(义)之邦,奋桴(枹)振鐸,辟启封疆(疆),方数百里,刺(列)城数十,克敌大邦^④。

由此可看出,在这次伐燕战争中,中山国趁机获得了不少利益,相邦𪔐亲率三军、奋枹振铎,取得土地数百里、列城数十座,可能还有其他战利品^⑤。

中山国虽参加了伐燕战争,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齐国,齐国想趁燕内乱之机侵占燕国,因此,当齐国进入燕国都城后,至战争结束时并未从那里撤出,一直占领燕国达二年之久^⑥。

齐对燕的占领,引起燕国人民的反抗,也激化了各国间的矛盾。赵国在得知燕王哙死的消息后,即“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并派将军乐池送至燕国即位,此即燕昭王^⑦。《孟子·公孙丑》记载,由于齐对燕的占领,引起“燕人畔”,可以想见燕人对齐军的反抗当是很激烈的。在其他国家的干预及燕人的反抗下,齐军无法再继续占领下去,不得不从燕国撤退。

齐军撤退后,燕昭王继位,燕国的一场大乱得以平定。史载,“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⑧,经过长期的恢复,燕国才逐渐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燕国的“禅让”事件,无论就其内容或后果来考察,对当时社会的发展都没有起任何的进步作用,它根本不是什么社会改革,子之也不是进步势力的代表,在禅让之前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培植私人势力,拉拢党羽,玩弄政治手腕,蓄意夺取政权。在“禅让”之后,即取得政权之后,他不

但没有什么进步的政绩,由于子之“贵而主断”,引起人民极大不满。至于燕王哙,他与子之不同,他并不着意于耍弄政治手腕,但他也还不是一个昏庸的国君,《韩非子·说疑》对他有下一段记述:

燕君子哙,邵公奭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涇汙池台榭,外不罾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于此矣。然而子哙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

燕王哙能“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这在古代君王之中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说“虽古之所谓圣贤明君者,其勤而忧世不于此矣”。在《韩非子》作者看来,似燕王哙这样一位国君竟然遭到惨重的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明乎所以任臣也”。这是说他任人不明,重用了子之,使子之权势过大,最后夺取了国家政权。由此可见,燕王哙的政权是被子之“夺”去的,所谓“禅让”,只不过是夺权的一种粉饰性语言而已。

另外,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说,它对社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还是破坏作用,这是考察一个历史事件应该注意的内容之一。在这里应该指出的一点是燕国的所谓“禅让”,最后的结局并没有给燕国带来繁荣和发展,反而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几乎导致了燕国的灭亡。似这样的事件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肯定之处。

注:

- ① 此据《史记年表》。
- ②②③ 《史记·燕世家》。
- ③⑨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 ④ 杨宽:《战国史》第151~1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
- ⑤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第384~3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 ⑥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北京史》第18页,北京出版社。
- ⑦ 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第16~20页,中华书局。
- ⑧ 原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1期,后收入《古史辨》第

七册。

- ⑩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顾广圻曰:今本“浅娟”作“羽翼”。王先谦改浅娟为羽翼曰:按《汉书·张良传》:“太子相四皓,高帝曰:羽翼已成。”则岩穴之士真人主之羽翼。浅娟二字不辞。
- ⑪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顾广圻曰:今本阙作隐。
- ⑫ 此“持”字应为“侍”字。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云:“黄丕烈曰:鲍改‘持’为‘侍’。……《世家·索隐》引此《策》文正作‘侍’。”
- ⑬ “秦”当为“齐”字。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云:“苏代终身未曾入秦,当无为秦使燕之事,且下文以齐言而以秦言,亦为自齐来燕之证。”
- ⑭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云:“贡谓向齐纳贡。赐,谓赏赐苏代。”
- ⑮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云:孙诒让曰:“‘以类’当作‘此类’。”
- ⑯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 ⑰ 《史记·孙子吴起传》。
- ⑱ 《史记·商君传》。
- ⑲ 《史记·老子韩非传》。
- ⑳ 指子之在位三年。
- ㉑ 燕国大乱。
- ㉒ 本文所用《中山王璽壶》及《中山王璽鼎》铭的文字隶定及释文主要依据张政粮《中山王璽壶及鼎铭考释》,并参考赵诚《〈中山壶〉、〈中山鼎〉铭文试释》,二文均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版。
- ㉓ 《中山王璽壶》铭文云:“中山王璽,命相邦心,择郢(燕)吉金,铸为彝壶。”其中提到“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说明铸此壶所用之铜是选择从燕国俘获来的战利品。可以想见,当时的战利品绝不会仅仅只有铜器,可能还有其他物品。
- ㉔ 《史记年表》在公元前311年下云:“燕昭王元年”。此处所云“君哙及太子相子之皆死”之年,应为齐军进入燕国之年,所云“燕昭王元年”即燕昭王即位之年,应是齐军已经撤退之年。据此,齐军占领燕国,应是经历了公元前314、前313、前312三个年头。此外,《战国策·燕策一》云:“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为昭王”。《史记·燕世家》所记与此同,这里明确记载从燕王哙死至昭王立的时间(即齐军在燕国占领所延续的时间)为二年。本文依《战国策》及《燕世家》。
- ㉕ 《史记·赵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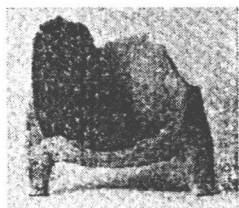
京华旧事存真(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

苏天钧

白云观西距北京西便门约 0.5 公里,这里是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的一部,传说古代的蓟城也在这里。1956 年在这里发现了一处遗址,遗址范围很广,西至环城铁路以西 5 米,白云观以东至西便门一带,南至椿树馆,北至护城河北岸以北 80 米,遗址的地表分散着各时代的陶瓷片,陶片较多是在白云观以西。我们开掘了一条长 20、宽 8 米的探沟,其层位如下:



图一 残陶鬲

第一层 土色深黄,含沙,土质松软,厚 70—85 厘米,地层被明、清墓葬打破。内含少量的辽、金时代的陶瓷片及砖瓦,其中有一个典型的辽代兽面纹瓦当。在表土层的东南角,发现长方形灰坑一个,口部大于底部,打破下两个层次



图二 汉井和井中的陶罐

表土层 厚 40—45 厘米,为含沙黄土,包含战国以后直到明、清的陶瓷片,这个文化层次所以这样混乱的原因,是被耕种扰乱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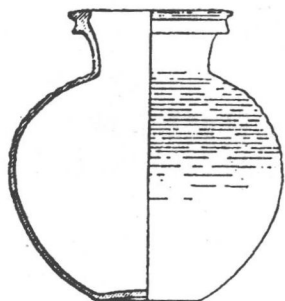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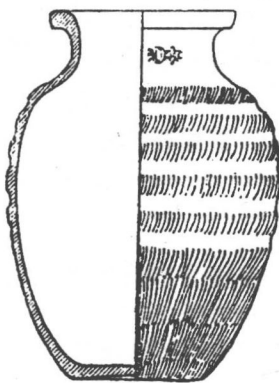
(包含物有辽代砖瓦和陶瓷碎片)。

第二层 土色黄褐,厚 50 厘米,土质较硬。有少部份被扰。内含少量的泥质灰陶和夹砂粗红陶,另外还有陶井三处,陶井直深入地下

5 米,打破第三层(井底中部有几个泥质灰陶罐),文化遗物都属于两汉时代。

第三层 土色黄灰,厚 28—30 厘米,包含着少量夹砂粗红陶、夹砂粗灰陶和泥质灰陶,器形有鬲(图一)、盆、罐等,另外还发现陶井两处。根据出土遗物来看,这层当属战国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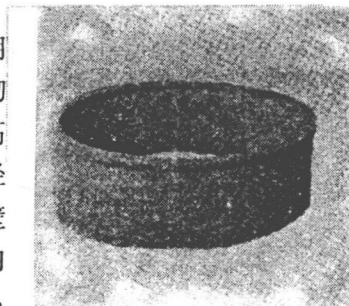
此外,还发现了 151 座陶井,分布在会城门村直到宣武门豁口一带。陶井群最密集的地方是白云观以西至宣武门豁口一段,有 130 座。其余均在



图三 陶罐(1. 战国 2. 汉,均 1/6)

白云观以西处,最密处六平方米内重叠达四处之多,可证当时这里人口是相当密集的。陶井的时代是由战国到西汉,其中战国的 36 座、汉代的 115 座。

汉代陶井是用一节节的陶管叠砌而成,每节高 38.5—20.5、直径 68—91 厘米,外壁印有粗、细绳纹,内壁印旋涡纹、云纹,也有不印花纹的。



图四 战国陶井圈